

清许槱藏“董武钟”全形拓本及相关问题

李 霏

内容提要：清中后期，董武钟以篆文“奇古”的“商器”名重一时，与学者许槱及其金石同仁对于吉金著录古器的重新审视密切相关。许槱藏“董武钟”的传拓与研究，真实反映了咸丰年间鉴赏考辨、存古传古的境况。其器下落不明，存世全形本则揭示了这件伪董武钟的“真面”。本文考察以许氏藏“董武钟”全形拓为中心的相关鉴赏与品题析出拓本的文献辑佚价值；以“董武钟”为个案，试析咸丰年间全形拓的技艺与观念，还原金石学家对篆文“奇古”的认知情境，解读全形拓品题背后金石学家的崇古观念。

关键词：许槱 董武钟 全形拓 奇古

一、问题的提出

董武钟，是南宋王厚之辑宋拓《钟鼎款识》之首器。《钟鼎款识》存钟体正面拓（图1），铭文钤间2行6字、左右鼓各1行2字，共4行10字，篆部、正鼓部纹饰，几不可辨。该器久佚不传，拓本经赵孟頫、项元汴、曹溶、朱彝尊、马寒中等名家递藏。清嘉庆七年（1802），阮元（1764—1849）得藏《钟鼎款识》宋拓原本，重加考释摹刻，引吴东发、钱坫之说作考证，始名其为“董武钟”。影刻本《宋王复斋钟鼎款识》（嘉庆七年刊，以下简称《复斋》）梓行后，阮元又摹钟铭著录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嘉庆九年刊，以下简称《积古》），列为首器，有释文及详细考释，云“此篆奇古，是商初之器”，释铭文为“戎起动武搏用吴疆口末”，此器始广为人知。^[1]此后又有“戎起钟”“动武钟”“搏武钟”等称。

董武钟，现名“戎起钟”，断代及钟铭考释尚存疑义。^[2]一说为战国时期器，一说为春秋晚期

[1]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清嘉庆九年阮氏自刻本，叶1a—2a。此钟在阮元影刻《钟鼎款识》后，经多家著录考辨，《积古》（1.1-2）、《揅古录金文》（2.1.46）、《商周彝器释铭》（1.26）、《古籀余论》（上.11）、《韡华阁集古录跋尾》（甲.1-2）等。

[2] 谭戒甫（1887—1974）《董武钟臆考》释为：“戎起搏武敷土吴疆。余末。”认为此钟绝非商器，或即春秋时吴国记功之器，“当为吴王余末所铸”。《集成》编号34，归为战国时期器，释为“戎起搏武，敷内吴疆，悉乍禾”。曹锦炎《鸟虫书通考》录器为“搏武钟”，提出是春秋晚期楚器，4行11字，铭为“戎起搏武，敷内吴疆，自乍禾”，“该器是一组编钟之一件，铭文非全铭，前后均应有钟铭与其衔接。……此钟是器主因率军攻入吴国境内，为纪念这一军功而作……器主或即屈申。”何琳仪提出为战国时越国器，器名为“戎桓钟”，全铭12字：“戎起搏武，敷内吴疆，兴世，石末。”参见谭戒甫：《董武钟臆考》，《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6年第5卷第3期，第565—581页；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何琳仪：《吴越徐舒金文选释》，黄德宽主编：《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何琳仪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3—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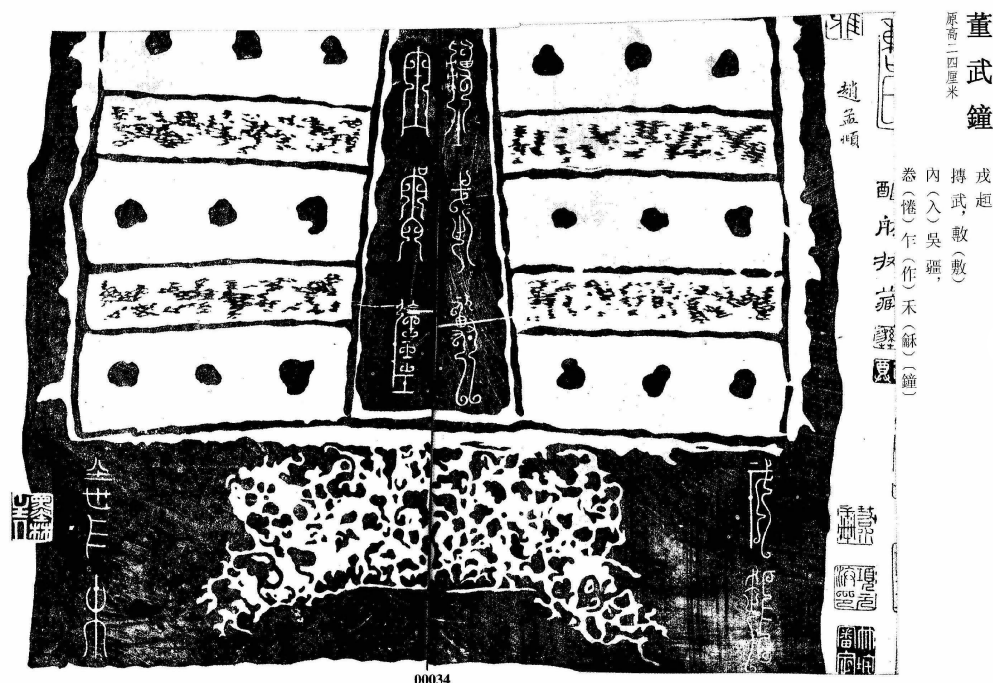


图1 《钟鼎款识》之“董武钟”（采自嘉庆七年阮氏积古斋影刻宋拓本，叶3b—4a）

器，《集成》释铭文为“戎起搏武，敷内吴疆，卷乍禾”。

清许槌所藏“董武钟”，系咸丰五年（1855）九月许氏途经淮阴时于市中购得。此器仅见吴式芬《攷古录》《攷古录金文》著录。光绪年间为许氏家仆窃售，流失海外，下落不明。幸有全形拓本流传，俾今人知其形制。该器铭文字数、字体、内容与《复斋》首钟相同，字画偏旁稍异，但钟之形制迥异。4行10字铭文皆在正鼓，通体无纹饰。

古器全形拓上的题跋、识语，往往承载了藏器者、拓器者、鉴赏品题者的意趣与观念，这些意趣观念又随拓本而流传至今，许槌藏“董武钟”全形拓本即是此中十分有趣的例子。张祖伟《山东博物馆藏辑佚价值全形拓赏析》一文，首次研讨了许槌跋“董武钟”全形拓本的文献辑佚价值。该本跋语中，许槌断定自藏“董武钟”是真器，而王厚之所得系真器失踪后商贾据拓本仿作的伪器。^[1]笔者又检得若干拓本及影印资料，可资考察许槌藏钟的流传与相关品题。已知许槌藏器“董武钟”相关全形拓本，如下：

1. 许槌监制并跋“董武钟”拓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2. 郑道乾旧藏“董武钟”拓本（私人收藏）
3. “陶斋”旧藏，杨铎手拓，杨铎、汪鋈、方濬益、蒋一桂、陈方瀛、吴大澂、罗振玉题识“董武钟”拓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4. 褚德彝旧藏“商动武钟”拓本（1925年《野语》影印，拓本收藏不详）
5. 陈锡钧旧藏“商董武钟”拓本（1936年《金石书画》影印，拓本收藏不详）

[1] 张祖伟：《山东博物馆藏辑佚价值全形拓赏析》，《北京文博文丛》2019年第2期，第53—54页。

以上各拓本再现了许槌藏钟的形制与铭文，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也是考察咸同年间全形拓技艺与观念的重要凭借。许槌拓董武钟全形的初衷是什么？许槌旧藏器是否董武钟“庐山真面”？据拓本跋文，各家均以董武钟为“商器”，原因为何？董武钟何以名重一时？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与回应。

二、许槌藏“董武钟”及相关拓本

（一）“董武钟”流传与鉴赏

许槌（1787—1862），初名映璉，字叔夏，号珊林、乐恬散人，浙江海宁长安人。（图2）金石学家、藏书家、刻书家，兼通医理。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官直隶知县、山东平度知州，历署淮安、镇江、徐州知府。精《说文》，亦谙熟钟鼎文字，“研精小学，搜集金石，凡鼎彝盘鉴刀布、碑帖瓦砖之属，靡不究心，而所诣精绝。”^[1]著有《说文解字疏笺》（已佚）、《古均阁宝刻录》等。许槌嗜藏金石经年，与赵魏（1746—1825）为忘年交，又为阮元门生^[2]，交游广阔^[3]，常于历官之地访古毡拓。自述：“余之为此五十余年矣。综计前后所获金石各本，商周秦汉而下，不啻数千种，凡遐陬僻壤度可致，无不搜索以如其愿者。”^[4]

许槌得藏董武钟始末，极少见文献记载。山东省博物馆藏董武钟全形拓本（图3），有许氏长跋，详述得器始末，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原文彙录如下：

咸丰乙卯九月，偶经淮阴市上，睹一钟，知为古物。亟以数金易归，土华绣蚀，谛视几无一字，以酢浆浸拭十余日，全文始显，乃仪征阮文达师《积古斋款识》所载“董武钟”，从宋王复斋拓本编入者也。然以复斋原本比较参稽，形

清代学者像传 第二集 许槌



四九五

图2 许槌像（采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叶恭绰辑、杨鹏秋摹绘）

[1] （清）丁晏：《颐志斋感旧诗》，民国四年罗氏铅印雪堂丛刻本，叶8a。

[2] 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阮元主持了此年浙江典试，许槌成为阮元门生。“癸巳以礼部试，出仪征相国阮芸台先生之门。先生于金石之学海内称最，时与余口讲指书，兼诂各旧本数十百种。”见《古均阁宝刻录叙》。

[3] 据许槌《古均阁宝刻录叙》：“余弱冠即喜好金石文字。壮游京师，同好者为徐星伯、刘燕庭、叶东卿、刘春园、李方赤、冯晋鱼、吴子苾诸君，朝夕过从，各出所藏弄……”（参见《古均阁遗著·文》，清光绪十四年刻本，叶28a。）道光七年（1827）丁亥，李璋煜邀校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同参校者有许瀚、王筠、陈宗彝等。道光十五年（1835），与吴振棫、叶润臣、何绍基、吴式芬、许瀚、王筠、李璋煜、刘燕庭、陈介祺等人合助翟云升《隶篇》成书。

[4] （清）许槌：《古均阁遗著·文》，清光绪十四年刻本，叶2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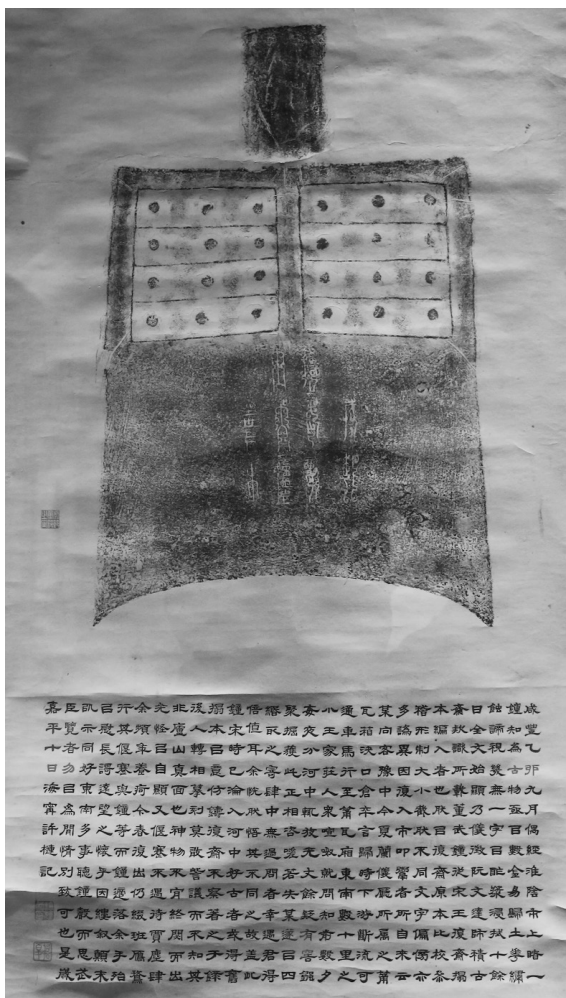


图3 许槌监制并跋“董武钟”拓本（山东省博物馆藏）

制大小截然不同，文字偏傍亦多讹异。因复入市，叩鬻者所自来。云：某向客豫中，今夏兰仪厅所属之筒瓦箱决口，仓促言归。时下游断流可通车马，行至筒瓦厢东南数十里之小王家庄，人众喧呶，就问，知前数夕每夜分，河中辄放光丈余，疑有窖镪，聚掘获此。正相咨嗟若失，某遂以四缗取之，寄肆中无过问者，幸遇君，得倍值耳。余恍然悟其不同之故，盖此钟宋时已沦入河中，好古者或得旧拓本，以意仿铸，复斋不察，著之于录，后人转相摹刻，莫敢訾议，而不知其非庐山真面也。神物不去肯终闷，而出光怪以自显，又偃蹇不遇，待价尘肆。余频年养疴，今春复出，仍缀班雁鹜行，其偃蹇与钟等，而钟适落予手，殆以慰长歌远望之怀乎！因缕叙颠末，以示同好。东南多事，听钟声而思武臣，览者勿以为闲情别致可也。是岁嘉平十日，海宁许槌记。

咸丰乙卯（1855）九月，许氏途经淮阴时购得此钟。洗剔后方知铭文内容，与《积古》依王厚之拓本摹入的“董武钟”同，而形制却与王厚之“原本”^[1]中的董武钟迥然相异。许氏复询此钟来历，鬻者答是在河南筒瓦厢遇黄河决口时所得之物。嘉庆九年（1804），阮元摹董武钟铭文刻入《积古》，列为首器。后董武钟迭经名家鉴

赏著录。相隔五十余年后，许槌得“出土”同铭器，珍若珙璧，凭其学术敏感亟予考究。董武钟之形制，在他看来遽成谜题。

筒瓦厢又称铜瓦厢，原名铜牙城，清属兰仪县（今河南兰考）管辖。据相关研究，筒瓦厢决口发生于该年六月十九日。^[2]“放光丈余，疑有窖镪”，鬻者所言，与自宋代以来叙述古器“遇晦冥，即光彩出没”的瑰奇场景的说辞如出一辙，而这正契合了许槌嗜古的心理，让他“恍然悟其不同”。

“缀班雁鹜行，其偃蹇与钟等”句，是许氏对自己仕途经历的慨叹，此困顿心境在董武钟上有所寄寓。因此，河决器出的时事、“藏器待时”的心境，加之嗜古物之癖，令许槌相信估人所言，并断定自己所得河中之物系真器，而宋王厚之所录者乃真器失踪后“好古者”据旧拓本仿铸的伪器。

[1] 许槌此处云“原本”，不然。宋拓《钟鼎款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毁于火，许槌此时比较参稽，所据当是嘉庆七年（1802）阮氏据宋拓摹刻本。

[2] 铜瓦厢曾是明清两代的河防险要。咸丰五年（1855）夏，黄河在今河南兰考县北部铜瓦厢小镇决口。参见《铜瓦厢：一个渐行渐远的名词》，《开封日报》2019年12月4日。

咸丰年间，“董武钟”作为许槌藏器中的名品，已经为其友人所熟知。在苏时，许氏曾邀韩崇（1783—1860）、吴云（1811—1883）、杨文荪^[1]、翁大年等嗜藏金石者称觞品赏。吴云致李鸿裔札中涉及此钟交易之事，并忆往日与诸友赏钟的情景：

许靖甫赴戍需费，以家藏第一宝器董武钟求价。正月间，岷堂曾说及询价欲二千金，告以物虽著名，值恐过贵，大江远隔，昇运不易，须得减价或可作合，否则徒费说话周折而已。其意托介于怀心阁、过云楼也。岷堂云靖甫若非万不得已，必不肯抱此器以求售。无已以一千金立脚，多一金则受一金之惠，千金之内勿议也。兹将信及拓本奉览。当日珊林先生得此器奉为异宝。在苏时，曾邀韩履丈、杨芸老、翁叔均与鄙人酌酒评赏。审其篆文，尚在西周之前。而铭在两乘之中，亦与他钟有异，如合鉴赏，望即士知。惟价恐不能减少也。^[2]

“得此器奉为异宝”，足见许槌对董武钟的珍重。据吴云、韩崇等人的行迹推测，酌酒赏钟之事，当发生在咸丰六年（1856）。咸丰十年（1860），苏州陷入庚申之劫，许槌家藏图籍尽付劫灰，“吉金唯商周二钟”留存。^[3]据札中所言，许氏以此钟为“家藏第一宝器”。同治、光绪年间，董武钟以“名最高”，与“声名最烜赫”的齐侯罍、“藏者最秘”的毛公鼎、“价最重”的大盂鼎^[4]，同为当世注目。《复斋》《积古》著录，许槌藏器传拓，吴云、翁大年等学者的赏钟活动，均是促成此钟“名最高”的重要因素。许槌离世后，其子许颂宣（字靖甫）以钟求售，事在光绪四年（1878）。^[5]其后，该钟光绪年间为许氏家仆窃售，旋流失海外，下落不明。^[6]

（二）许槌监制并跋“董武钟”全形拓本

1. 拓本析读

山东省博物馆藏《董武钟全形拓本》（镜心），上部为钟全形，左下钤“虎节鱼符之室”白文方印，下部为咸丰五年十二月许槌题记，末钤“许槌私印”白文方印、“叔夏”朱文方印。拓者不详。“虎节鱼符之室”很可能是收藏印，具体何氏，有待考证。据张祖伟撰文介绍：“拓本采用清人惯用的青铜钟制拓法：平视构图，器形仅表现为轮廓线形，用墨不注重阴阳浓淡变化，甚至甬部也不例外，立体感相对不强，整体风格比较古朴。”^[7]

北京泰和嘉成2009年秋拍（Lot0803）《董武钟拓本》（一轴），据拍品描述：立轴，纸本，

[1] 杨文荪（1782—？），字秀实，号芸士、芸墅。浙江海宁人，寓居仁和。中年曾随许槌作幕僚，晚年移居苏州。

[2] （清）吴云：《两罍轩尺牋》卷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838页。

[3] 据吴云致许槌札，见《两罍轩尺牋》卷一，第77页。

[4] 《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九十一《论金石札二》，第10378页。

[5] 吴云作此札的时间，参阅吴云著，白云娇集释：《吴云函札辑释》，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29页。

[6] 陈邦福考许珊林藏董武钟，案语云：“此钟当日曾藏许氏，光绪中为其家仆窃售与古董商人，当时即流入海外，新中国成立后邦福在无锡，见友人秦古柳藏有珊林子孙拓本，题记被人攘事甚详，特附记于此。”参见陈直著，周晓陆、陈晓捷编：《读金日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7] 张祖伟：《山东博物馆藏辑佚价值全形拓赏析》，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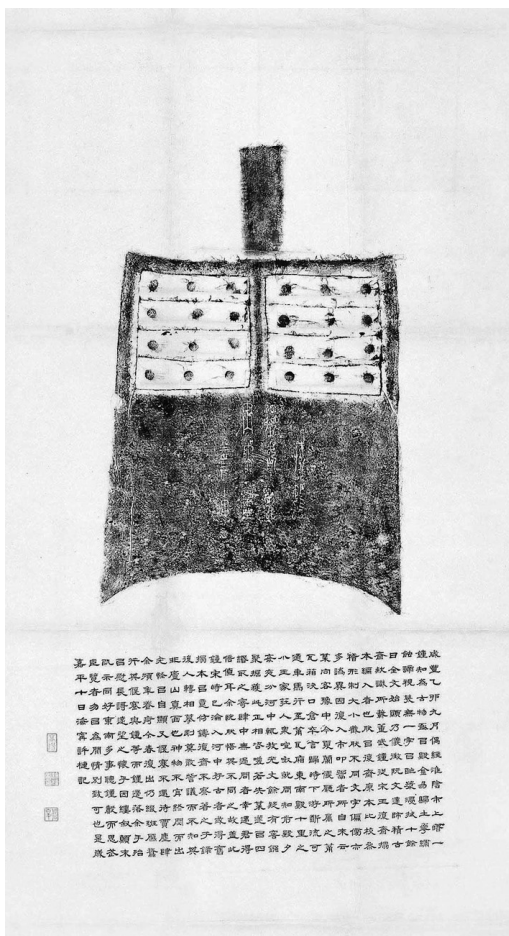


图4 《董武钟》拓片轴，纵130cm，横66cm，郑道乾旧藏，中国书店2014年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Lot1201 [采自《中国书店2014年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五）古籍善本、书札专场》，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图录，第250页]

旧装，下有许槌题跋，为木刻印刷，极为稀见。铃“高阳”朱文长方印、“许槌私印”白文方印、“叔夏”朱文方印。^[1]中国书店2014年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Lot1201）《董武钟拓片》（图4），清咸丰拓本，1轴，纵130厘米，横66厘米，拓本左下角铃“郑道乾审藏”朱文方印。^[2]二者当为同一拓本，即清郑道乾旧藏本。上图下跋的形式，与山博藏本同，但下部许槌题记，为木刻印刷。此本亦当归为许氏监拓本。立体感不强，甬部较细，枚部有错位现象，且枚部墨拓轻重不一。

现有文献资料缺少许槌在咸丰五年行事的相关记述。^[3]董武钟全形的拓制地点与时间无法确考。九月得器，至迟在十二月许氏已有全形拓分予同好。考虑到题记木刻复制的属性，当时分赠金石友者，或许不在少数。许氏藏钟、赏钟、作拓之举，在咸丰年间当有一定的认知度。笔者查索同时期的文集资料，检得时人朱允元诗《戊起钟歌（咸丰乙卯许珊林先生得于淮阴市上自有记）》。按诗句所咏，作者当曾获见许氏题记及钟拓本，称器为“戊起钟”。歌中有“濯以酢浆焕光采，顿慰平生金石缘”，其观点显然来自许槌题记内容，以《复斋》《积古》所录为“千秋贗鼎”：

天意欲教瑰宝显，简厢决口洪波连。……夏后雕戈应侧色，岐阳石鼓可比肩。……积古摹图据王本，千秋贗鼎恣搜研。……即今流传吉光羽，宝气

直欲照坤乾。……世间毡蜡尚未到，随珠和璧难独专。何不摹拓亿万纸，云回古籀体重笺。东南艺林齐寓目，置身恍在周秦前。^[4]

[1] 引自雅昌拍卖网<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91010803>。

[2] 郑道乾，生卒年不详，号健盦，又号悔庐，仁和（今杭州）人，清末民国藏书家，吴昌硕门人。纂《国朝杭郡词辑》。

[3] 许槌中进士后曾官山东平度七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迁江苏淮安知府，二十九年（1849）署镇江知府，道光三十年（1850）任江苏粮储道，驻常熟城。咸丰六年（1856），因病留苏州，至十年（1860），避乱迁至如皋。同治元年（1862）卒于如皋。参阅许淮祥：《猗叟诗集》，《晚清四部丛刊》第六编第114册，第9页。

[4] （清）朱允元：《戊起钟歌》，（清）潘衍桐编纂，夏勇、熊湘整理：《两浙輶轩续录》第12册卷四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05页。朱允元，字客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著《侨东草堂诗集》，咸丰初年曾应许槌聘，寓居吴门二载，授许槌子许淮祥、女许诵珠读。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史料均未见收录许槌题记内容，现存吉金著录之书亦未见载许氏藏钟之形，许槌监制并跋“董武钟”全形拓，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而《戊起钟歌》恰能代表咸丰年间一部分吴中讲求金石者对董武钟的认知。

五十余年后，清末况周颐（1859—1926）目睹带有许氏题记的董武钟全形拓本，曾细究其形制大小，《蕙风簃随笔》中有“董武钟”一则，况氏比较了拓本与“摹本”之别，对许槌的真伪判断深以为然^[1]，并析出形制、钟体尺寸、款字及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极其细致。由此可见许槌监制全形拓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复斋》依拓本摹刻了钟体正面，并非全形，因此况文对“无悬”“唇与两角平”的描述，可能并非事实。但文中对许槌拓本中形制、字径尺寸的记录，同样具有辑佚价值，足资参考。

许槌于题记末尾说，时局动乱，他考辨古钟、拓全形并非出于闲情逸致。并拈出《礼记·乐记》中“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一句，表明心迹。这是士人于动乱时局中鉴古赏古的一种心态流露。即便如此，无可否认，受赠者亲睹全形，对其“浑朴”“古雅”的历史感和美感，由衷赞叹。曾被装为清供的杨铎手拓本，即透露出这一点。

2. “董武钟”真面释解

许槌藏器仅见吴式芬《攷古录》《攷古录金文》著录铭文，其器形传世，皆赖全形拓。关于董武钟真伪，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王厚之《钟鼎款识》所收为伪器，乃宋人伪作。^[2]明确持此论者有许槌、况周颐。潘祖荫（1830—1890）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批校《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董武钟”，写道：“此系北宋人伪造无疑。以此首列，殊为无识。壬申十月初二日，伯寅记。”^[3]该句批注于该页眉端，指阮元以北宋人伪造器列于书首，绝失精审。但同页器名下还有一行批语：“丁丑细勘，当是越勾践时器，释曰：□戌越铸武罇定吴疆□八十一世□末。”（图5）丁丑即光绪三年（1877）。由此

[1] 商董武钟，咸丰乙卯夏出汾河中。拓本上有海宁许槌记。即阮文积古斋著录第一器，从宋王复斋摹本编入者也。然以复斋摹本比较，形制迥然不同。许云此钟宋时已沦入河中，好古者或得旧拓本以意仿铸，复斋不查，著之于录，后人转相摹刻而不知其非庐山真面目。殆信然矣。摹本无县，钟体上下尺寸略同，钲间阔，容款字两行，自衡已下为篆，以介之，凡五。为枚十八。衡、甬、舞、钲，约居钟体三分之二。鼓、于居三分之一。唇与两角平。阮释“动武搏用吴疆”，两行，行三字，在钲间。“戎起”二字在右栞，“□末”二字在左栞。拓本有县，钟体上狭下阔，钲间狭，不能容款字。自衡以下为篆，以介之，凡四。为枚四十。衡、甬、舞、钲居钟体十二分之五。鼓、于居十二分之七。唇不与两角平，微作偃月式。款字四行，并在鼓间，相距近远如一、“戎起”二字与“武搏”并，“□末”二字与“吴疆”并，不近两栞。钟体上阔一尺零五分，下阔一尺二寸，两旁各高一尺四寸，正中高一尺二寸四分，县高四寸一分，上阔一寸八分，下阔二寸四分，字径一寸五分，强弱不等。参见况周颐：《蕙风簃随笔》卷一，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2] 关于《钟鼎款识》首器董武钟拓本，是否为王厚之所辑，尚存异议。有可能是赵孟頫藏册时增入。“每器题款释文，阮元谓出厚之笔，而首叶‘董武钟’及册后‘方城范氏钟’以下两叶，只有‘大雅’印，无‘厚之’、‘复斋’等印。钱大昕跋但疑‘范氏钟’以下是赵增入，故‘楚古雷钟’复出。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并疑首叶亦赵增入，其说良是。”参见胡玉缙撰，吴格整理：《续四库提要三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3] （清）阮元、朱为弼撰，（清）潘祖荫批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清嘉庆九年阮氏刻本，叶1a，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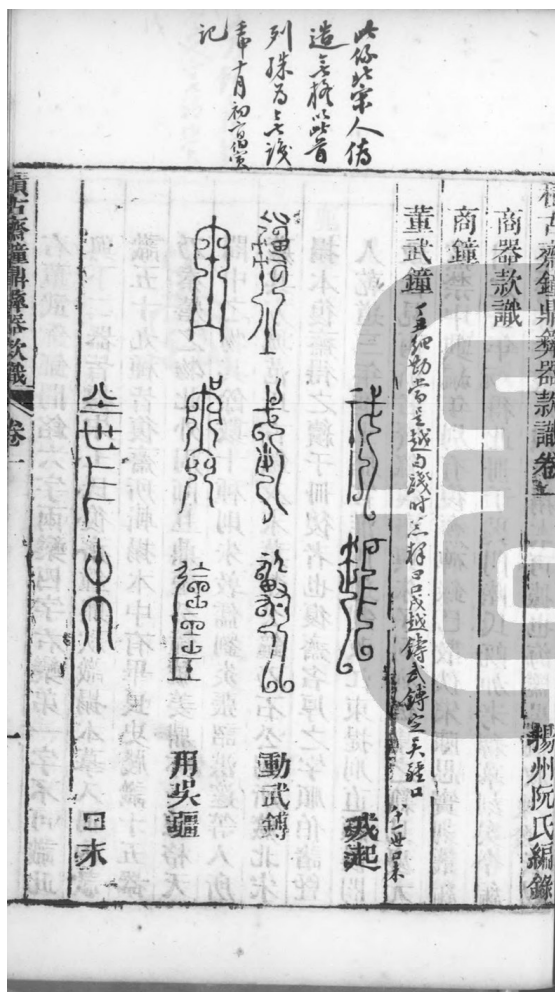


图5 潘祖荫批注“董武钟”[采自(清)阮元、朱为弼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清嘉庆九年阮氏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可知,五年之后潘祖荫改变了《钟鼎款识》《积古》所录董武钟为北宋人伪造器的观点^[1],改断为春秋晚期越国器,并写下自己的释文。

二、许槌所藏器为伪器。如王国维《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定海宁许氏所藏为伪器,注为“即翻刻宋本”。^[2]

三、董武钟有二器,王厚之辑拓与许槌经藏者,各为一器。持此论者,所见有三:吴式芬《攷古录》著录董武钟二器,铭文同,一为“积古斋摹宋王复斋拓本”,一为“浙江海宁许珊林槌藏”。^[3]并在《攷古录金文》卷二摹录了二器铭文。《金文分域编》卷十一“周董武钟”载:

“《蕙风簃随笔》:咸丰乙卯夏出汾河中,拓本上下有许槌印记,即积古斋著录器。案当另为一器。”^[4]又陈邦福考证《董武钟》,认为:“至于王复斋款识著录者,疑别一器。”

四、二者均为伪器。张之洞(1837—1909)以铭文繁重诘屈,不合篆籀之体,难求其义,指钟是宋人“伪物”:

《积古斋款识》第一器曰董武钟,即伪物也。……此乃北宋妄人之所为,与三十六体书之怪妄等,何阮氏之博通,乃神之曰商器乎!……

故篆文近万,唯有不可说其义者,虽以钟鼎款识

之生僻罕见、变动不居,皆有意义可以寻求,从无任意盘屈向背、缪乱缴绕如是者,此惟张旭、怀素草书则有之矣,三代篆文安有是哉。……此钟文,繁其画而不繁其体,既不合于篆与籀矣,何问周以前哉!^[5]

[1] 潘祖荫旧注当源于“酷信”张之洞之说。据张之洞《论金石札二·董武钟》:“……曩闻执事曾谈及此钟,晚亦不知尊意云何也。特恐万一谈而煮之,煮而购之,费必不资,既已购得,一见之后必且悔之。晚素荷挚爱,故斤斤过虑,一妄言之耳。执事来示所云酷信鄙论,此自贤者嗜痴之过耳,岂真可信耶?抑或者局外静观,偶有幸中耳,其实不足当金石家一哂也。”参见《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九十一《论金石札二·董武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72—10373页。据此知潘祖荫曾欲购“董武钟”,所指是许槌旧藏器或另为一器,暂不可考。

[2] 王国维:《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卷一,民国二十二年墨缘堂石印本,叶7b。

[3] (清)吴式芬:《攷古录》卷二,清末刻本,叶14a。

[4] 《金文分域编》卷十一,民国二十四年胶西柯氏排印余园丛刻本,叶20b。

[5] 《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九十一《论金石札二·董武钟》,第10372—10373页。从文意可知,张之洞认为钟凡有此类铭文者皆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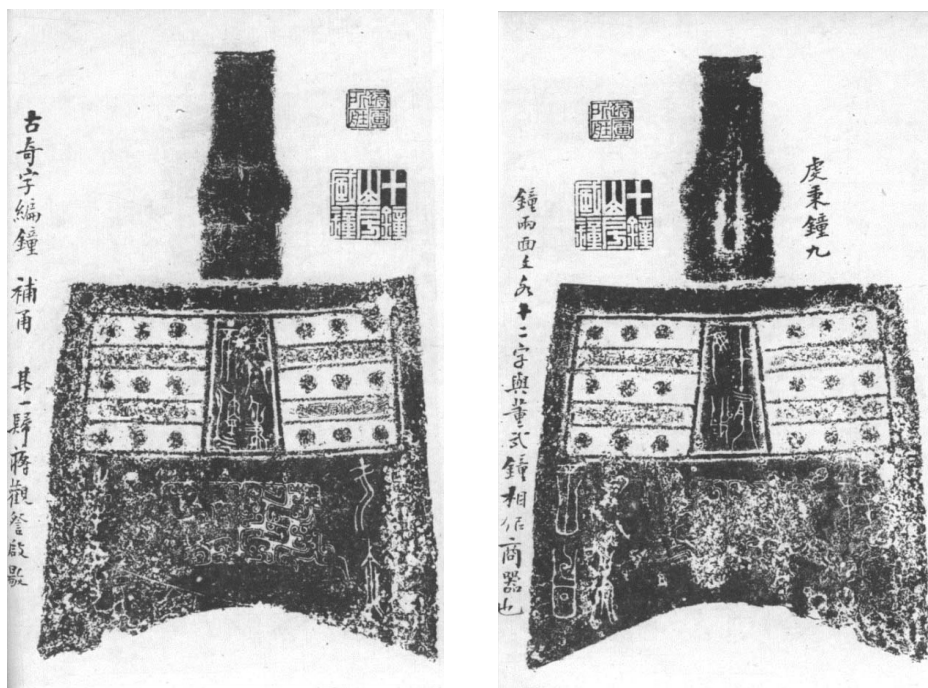


图6 陈介祺藏器《度乘钟》拓本（采自《簠斋吉金录》，民国七年风雨楼石印本）

“任意盘屈向背、缪乱缴绕”，张之洞断真亦为伪，根源在于对铭文书体的认识存在局限。许槌、况周颐则误以伪为真。持二钟同铭、各为一器之说，则是未能作出判断。唯王国维明确提出许槌藏器为伪。尽管王厚之《钟鼎款识》中董武钟拓本来源尚无定论，拓自原器或为摹本仍存分歧，但许槌很可能是误判，而以真为伪。许槌藏器是刻意作伪用以牟利的一件器物（在无铭真器上刻凿伪铭）几无疑义。理由如下：

一、铭文字形僵硬、钝滞，与《复斋》本相比，神韵不足，正如谭戒甫先生所论“笔画粗劣，失之愈远矣”。

二、分析现存周钟之铭文位置，如陈介祺所藏“古奇字”钟（图6，按：即者沪罇，或称度乘钟，战国早期器），铭文在钲间及两鼓，书体亦为鸟虫书。而如许氏藏器铭文皆在正鼓部，且文字布局如此者，传世周钟（或拓本）中尚未见此例。

三、《复斋》摹刻了董武钟正面拓，但此书流传较少，当是作伪者或未曾得见，而直接据《积古》中摹写的钟文（图5）翻刻作伪，文字排列方式遂同《积古》。

四、道咸年间，与《积古》中董武钟同铭的器物有若干件，皆属真古器上刻伪铭。清陈宗彝批识《积古》“董武钟”云：“近见古铎，市贾刻此文以欺人，不知此本钟也。初见几为其所惑，质李方赤观察始定。”^[1]陈宗彝记录了自己所见古铎，经李方赤即李璋煜（1784—1857）辨别，方知铭文系伪刻。可见，当时非仔细辨识，很可能被黠贾所欺。

[1] （清）阮元、朱为弼撰，（清）陈宗彝批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清嘉庆九年阮氏刻本，叶1a，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陈宗彝，初名秋涛，字雪峰，号嗜古，室号独抱庐。江苏江宁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道光、咸丰年间。孙渊如弟子，嗜金石，精六书。曾编刻《独抱庐丛刻》十一种。

五、许槱所藏“董武钟”实为一件四列枚式扁钟，其形制是：合瓦形腔体，圆柱状甬，无旋、斡，微侈铎，弧于，鼓部长于钲部，钲间狭小，通体光素无饰。四列枚式，对称排列，两面共四十八枚。据考古资料，扁钟主要出土于鄂西清江流域、川东、湘西北等古代巴人聚散地（故又被称为“巴钟”），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数量不多，多以窖藏单件出现，年代跨度为战国至东汉。如1979年出土的湖北恩施建始县白崖扁钟，1984年出土的湖北长阳县渠安头窖藏扁钟，与许氏藏钟即为同一形制。

随着考据学的发展，特别是嘉庆九年阮元辑刻《积古》以来，金石藏家对款识的重视远甚于前。作伪者深谙学术主流中此种嗜古重文的心理，至嘉庆末年始出现在真器上刻凿伪铭的作伪现象：或于无字古器上伪刻铭文，或于字少之器上加刻伪铭。一些金石藏家不免间收伪器。张廷济

（1768—1848）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购得的“周篆带水字钟”（载《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属于前一类伪刻。叶志诜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得的遂启祺鼎，即加刻伪铭的一个著名例子。陈宗彝也曾困惑于伪刻铭文的“董武铎”，几为所欺。直至同光年间，此类作伪仍很难辨识。^[1]同治五年（1866），熟谙金石文字的许槱也被伪刻迷惑。许槱所得钟铭文是当时罕见的鸟虫书，仿刻《积古》中的董武钟，其作伪时间很可能在嘉庆末年至咸丰初年，却被许氏标举为董武钟的“庐山真面”。

（三）杨铎手拓“董武钟”全形拓本

1. 跋文析读

杨铎手拓“董武钟”全形，卷轴装，纵105厘米，横56厘米，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图7）拓本题跋共七则，记录了自同治十一年（1872）至民国十二年（1923）间，杨铎、方濬益、吴大澂、罗振玉等学者先后评品“董武钟”全形的情况。按题跋时间先后，释读如下：

同治十一年正月，杨铎隶书题端“董武钟”（拓本上右），下有行书题记：

铭文十字，壬申正月，商城杨铎题。（钐“商城杨氏石卿审定金石文字”朱文方印）



图7 《董武钟》拓本轴，纵105cm，横56cm，杨铎手拓（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品）

[1] 吴云致潘祖荫札中，对此鱼目相混的作伪现象曾发出感慨：“近日伪作者愈出愈奇，沪上已专有此一种人，广收无字旧器，合数人之力闭户覃精，伪造成文，比之宣和仿古实能远胜。盖器本原旧，文又工致，目前已不易识，数十百年后，恐巨眼者亦不能辨矣。”《两罍轩尺牘》卷八，第617页。

按：杨铎（1813—1879），名奕铎，字石卿，自署石道人，河南商城人。因试辄不第，游幕江淮。《墨林今话》称“酷嗜金石之学，少岁即遍游齐、鲁、燕、赵、吴、越、江、汉，凡钟鼎款识、残碑断碣，搜寻拓辑”。咸丰十一年（1861）擢县令，加同知衔。每不见用，仅委以厘捐、缉私等杂差达20年。光绪五年（1879），署震泽县知事，未及半年卒于任上。^[1]据同月方濬益跋语，是拓为杨石卿所拓。钟拓左侧有“石卿所拓金石”白文长方印。作拓时间不详。

汪鋈题记（拓本上左）：

戎起动武铸用吴疆□末。此钟名文，为殳文之始。砚山汪鋈记。（钤“砚山手写”）

按：汪鋈（1816—？），字砚山，亦作研山，室名十二砚斋，江苏仪征人。邃于金石，工诗，亦善画山水。题跋内容上为铭文摹写，下文为释文，内容与《积古》同，并提出钟铭书体是“秦书八体”之一“殳书”的源头。汪鋈此题，未署年月，据题记位置，当在杨铎之后。据其《扬州画苑录》云：“石卿与鋈交极亲，每过扬必至舍，出共所得金石拓本，互相印证。为余画扇册甚多，有逸气而无俗氛，不愧名士之作。”^[2]汪鋈与杨铎交契甚深，该记或为在扬州应杨铎之请而题。^[3]汪氏题记时间当同在正月，距杨铎题后不久。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方濬益题记（拓本下右）：

《董武钟》铭，见于阮氏《积古斋》著录，兹为杨石卿大令所拓本，陶斋得之，偶出见示。同观者海盐陈先海、无为蒋犀林、阜阳李麇生也。定远方濬益剪烛记之。（钤“方濬益印”白文方印）

按：方濬益（？—1899），字子聪，一作子听，亦字伯裕，安徽定远人，一作桐城人。江苏候补同知，历署南汇、奉贤知县。富藏金石。^[4]据其题记，该本是杨石卿大令即杨铎所拓，为陶斋所有。同观者还有陈先海、蒋犀林、李麇生，方濬益题于是日夜晚。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蒋犀林题记（拓本下中）：

陶斋博雅好古，片纸只字，极为珍贵。兹拓全神浑朴，刻势古雅，足供清玩。拟付潢池，置之几席，亦嗜古家之一癖也。犀林同日识。（无钤印）

[1] 杨琼：《志存于金石 事专于丹青——金石书画家杨铎生平记略》，黄振国主编：《信阳文史资料·第7辑·信阳文史资料大观》，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748—750页。

[2] （清）汪鋈：《扬州画苑录》卷四，清光绪十一年刻本，叶8。

[3] 此时杨铎寓居扬州。同治十年（1871）七月，何绍基在扬州面晤杨铎。另居杨石卿《元刘文正公回文李生镜铭》册，上有袁昶题，署曰“壬申四月，时同客扬州书局”。参见周绍良：《蓄墨小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页。

[4] 方濬益，善画花卉，书法六朝，藏弄金石甚富，又工刻印。著有《定远方氏吉金彝器款识》《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

按：蒋犀林（1830—1903），一作樾林，字一桂，以字行，廩贡生，原籍江西奉和，安徽无为人。^[1]同治十二年（1873）任川沙抚民厅同知。该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全神浑朴，刻势古雅”是对该拓美感的描述；二、此时拓本尚未装池，而当时的苏州以古器全形拓装为斋中清供，是嗜古之癖的一种体现。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陈方瀛题记（拓本下左）：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有七日，同人集于吴门节院小饮，陶斋出此属题，子听、犀林二君酒酣下笔，忘署岁月，仙海附识。（钤“陈方瀛印”白文方印）

按：陈方瀛（生卒年不详），字仙海，浙江海盐人。同治十年（1871）冬补松江府川沙抚民厅同知，十一年四月履任。公暇研精词翰，博考金石，尤喜晋接文士。^[2]

以上三跋书于同一天，陈氏在方、蒋二跋之后补记年月。据文意，正月二十七日“陶斋”觞于吴门节署，出此全形拓相与鉴赏，除李麀生外，三人均有题记。

光绪九年（1883）五月十二日，吴大澂题记一则：

此钟名文奇古，定为商器无疑。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吴大澂观。（钤“憲斋”朱文方印）

按：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清卿，号恒轩，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吴大澂的关注重点在于铭文，“名文奇古”“商器”，此观点源自《积古》。光绪九年五月，吴大澂身在吉林。^[3]此或为应他人请题。

民国十二年（1923）春，罗振玉题记一则：

此钟奇古，是商初之器。《积古斋》曾著录：“吴东发云动古通董，《周礼·春官·大祝辨》：‘九拜四曰振动。’郑大夫云：‘动读为董，《书》亦或为董。作钟铭功，故曰董武。’《左·昭十三年传》云‘董之以武师’是也。”此论洵是，不诬也。癸亥春日，贞松罗振玉记。（钤“振玉之印”白文方印）

按：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此跋引《积古》之

[1] 同治二年（1863）先后署理川沙、南汇，后奉檄督办吴江、震泽二县军饷税捐。三年署理吴江，督办芦墟粮局。十二年（1873）任川沙抚民厅同知，诰授资政大夫，赏二品顶戴。光绪十二年（1886）任南汇知县。十四年再署任吴江县。十八年署任震泽县。著有《金粟山房诗集》。善诗古文，工书法。

[2] 陈方瀛，少孤劬学，未弱冠游庠，随万青黎、许道身办理盐务、军需、河运等事。叙劳奖通判，分发江苏，历办苏省清粮善后局差，调办洋务局。张之洞抚吴，辟为幕僚，尤深倚重。著有《思寒斋文钞》《华山半席诗稿》等。参见俞樾著，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 《北征日记》：五月十一日，为余四十九初度之辰，至观音阁宴客。葆田携酒来会，峻峰都护及韵松、玉符、胜之偕来。参见顾廷龙：《吴宪斋先生年谱》，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版，第104页。

说，以钟为“商初之器”，赞同吴东发对“动”字的释读。另见罗振玉有《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札记》，残稿收录于《笔记丛残汇刊》，其中“董武钟”条云：“按：钟文中恒有此体，古兵器若戈剑之类亦有之，乃列国时物，非商初也。”^[1]题跋此本之后，罗振玉辨识出铭文自成一体，记为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器。这则札记与拓本中跋语内容相矛盾，可反映出罗氏对钟铭的认识过程。

以上跋语，均未提及许槌藏器与《复斋》董武钟形制大小、铭文字画的差异，这与藏器者许槌制作全形拓的初衷存在一定距离。其原因尚难考证。如果以思辨的眼光来看，晚清判断青铜古器价值的一般标准是以三代有文字的吉金为重，学者的研究仍是在传统书斋和拓本古纸的范围内，以识古字、认古文为主，偏重对文字或古礼制的考证。对“三代法物”的共同信仰、强烈的崇古思想，很可能扰乱他们对形制问题的判断。况且，对铭文和形制两者进行综合考辨，在当时是极少数好古富藏且有识见的人方具备的一种能力。

该本跋语内容反映出全形拓在考订和清玩两方面的功能，前者赏奇文、析疑义，显示全形拓成为更直观地考究器物铭文的载体；后者怡情，表明以全形拓装为清供，“董武钟”当被包含于同治、光绪年间此一风潮的流行脉络之中。依藏器时间判断，在吴中金石圈争相求索吴云藏齐侯两壘拓本之前，许槌藏董武钟全形，即在金石友人中流传，并因“浑朴”“古雅”成为珍视的对象。

2. 拓本制作者与旧藏者

据史料文献，杨石卿嗜金石成癖，舟车所至，随处搜求。在该拓题跋者中，杨铎、方濬益、汪鋈之间常互赠金石拓本，在各自文集中均有记录。^[2]杨石卿曾收藏阮元藏虢叔钟全形拓、程洪溥藏子璋钟全形拓^[3]，此拓本上“石卿所拓金石”印鉴，证实了杨铎手拓青铜器全形的史实，可补充咸丰、同治年间全形拓作拓者的资料。杨铎富藏亦精于金石校勘，并偶作全形，其名不以拓全形传，这种情形类似金石学家叶志诜（1779—1863）。（冯云鹏称其“善于锤拓”，详于下文讨论。）此本淡墨施拓，相比前述许氏监拓本，立体感稍弱，但墨拓晕染的效果比较突出。字口清晰，鼓部因锈蚀而产生的痕迹清晰可辨，枚部个别墨点不甚分明。舞部、甬部轮廓线似以水墨绘出，略显率意。在钟体两侧圆弧转折处，纸张产生的褶皱比较明显。此本当是整纸拓自原器，后用墨笔补绘。据《墨林今话》载杨铎“擅花卉，下笔俊爽，迅扫疾驰”，杨铎手拓本的墨晕效果，或多少与他擅长写意花卉有关。

是拓旧藏者无钤印，“陶斋”是何人？精金石收藏、字或号为陶斋、清同治年间活动在苏州一带，吴江人翁大年、乌程人周作谔均有可能。翁大年初名鸿，字叔钧，又字叔均，号陶斋。与吴云、许槌、韩崇等曾同处苏州金石鉴赏圈中，与方濬益亦有金石交流。但翁氏卒年时间尚无定

[1] 罗振玉：《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札记》，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雪堂剩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2] 《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中有三器“据杨石卿大令所诒拓本摹入”。据《函青阁金石记》卷三《汉光禄勋东平无监刘曜残碑》“王申四月定远方子听太令以此拓本见赠”。参见（清）杨铎：《函青阁金石记》卷三，清刻本，叶19b。汪鋈《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六，记“方子听大令”赠《王氏女造像》拓本。

[3] 杨铎旧藏本《虢叔钟全形拓》，现藏上海图书馆。许瀚著录子璋钟，录入两本，一为“右杨石卿所藏全形拓本，瀚手摹其文字存之”。参见《攀古小庐杂著》卷六，清光绪年间刻本，叶5b。

论^[1]，查其人亦未任官职。该拓本的旧藏者，当为周作谔。周作谔（生卒年不详），字陶斋，又字弢宰，号井南、井公、井南居士，浙江乌程（今湖州）人。附贡，官江苏知县，同治十一年署丹徒知县。据《吴昌硕石交集校补》中《周作谔传略》，周陶斋好古爱客，“能诗，工书画”。^[2]周作谔与杨铎、吴云为金石友，尤与吴昌硕相契。同治十二年，曾与张铭珂等吴中同仁结“修梅阁书画社”。周陶斋同治九年（1870）曾为杨铎藏砖拓本作跋。^[3]此拓本展现了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周陶斋与杨铎、方濬益、蒋犀林、陈方瀛等人的金石交流。此本或许还是杨铎与许梿之间交游的见证，因未见相关资料，尚待查考。

三、“庐山真面”与全形拓辨古、传古之用

（一）许梿的疑古与传古

董武钟在清代名重一时，与咸丰年间许梿的收藏辨识和作拓鉴赏直接相关。许氏藏器虽是伪刻铭文，以揭示“真面”为诉求的全形拓，却颇可玩味。

回到许梿的语境，其作拓的初衷，一是向同好介绍得器始末，一以俾同好知董武钟之“庐山真面”。他拓制全形，分贻同好，很大程度上带有豁蒙翳的心理。宋拓《钟鼎款识》在清代被认为是出自古器的原拓本，睹拓本如对原器。许梿基于“出土”物，质疑传世文献著录器的真伪，以《复斋》《积古》所录为贗器，可谓打破了“莫敢訾议”的局面。自藏器与著录器形制大小截然不同，无疑是他的一项重要“发现”。在当时，拓全形能够提供可视化的证据，是许梿将这一“发现”公诸同好、揭示“真面”的绝佳方式。全形拓本的长处，在于能够依照原器之大小，复制器形、纹饰及铭文，在纸上传达出器物形象，呈现出古器物的逼真状态。传古理想的驱动，或许令许梿更加审慎，从原器上取象存形，更有可信度。笔者揣度，许梿监拓本在全形立体感和用墨浓淡变化效果上的欠缺，部分可归因于原器施拓的技术欠佳，但许氏首要看重的，应是展现三代古器所散发出的典雅浑朴的真实感。

许梿监拓本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自作题记，曾采用刻木印刷的方式。此举便于复制传播，能够令当时热衷款识考订和关心古器流转经历的朋辈同好，有所凭借。许梿藏器是否曾翻刻全形以应索，尚不清楚。许梿及同时代金石学人，常有金石之寿不如楮墨的感叹。木刻题记与拓古器全形相配合，可视为实现其传古思想的重要手段。出于揭示“庐山真面”与阐明古器流传“真实”性的双

[1] 翁大年工书，行楷学翁方纲，笃嗜金石考据，精篆刻，善刻竹。著有《古兵符考略残稿》《陶斋金石文字跋尾》《旧馆坛碑考》等。其生卒一般系为1811—1890，不确。据翁大年子翁荣跋《乐府指迷》言“先君生平勤于述著”，署款为：“光绪八年壬午陬月，翁荣谨志。”则翁氏卒年当在光绪八年（1882）之前。又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陈介祺与翁氏尚有通信，同治四年（1865）三月陈作《玉印合编》序，序中提到陈粟园、翁大年等“皆作古人”。（参见陆明君：《陈介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则翁大年卒年当系于1865年。

[2] 周陶斋作谔，乌程人，官江苏知县。书法仿董文敏秀润天成，画花卉果品茗瓯蒲盎之属皆修洁可爱。参见《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三，清宣统二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铅印本，叶12a。

[3] 2016年西泠秋拍Lot4856“杨铎、戴望等题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文”，拓本为杨铎得之，向友人遍征题咏，上有同治六年（1867）杨铎跋，同治九年（1870）周作谔跋，钤“陶斋书画”朱文印。

重诉求，许槌将全形拓与木刻题记拓本合裱为一轴。因此，许氏监拓本，是“疑古”辨伪与“传古”思想结合的一个文本。作为许槌探寻和考证董武钟真面的实物佐证，监拓本体现了较早时期全形拓具有研究效力的一面。

（二）拓钟之法

目前所知“董武钟”全形，除许槌监拓本、杨铎手拓本外，有褚德彝（1871—1942）^[1]旧藏本、陈锡钧旧藏本，后二本仅见影印资料。褚德彝旧藏本（图8），《野语》1925年第3期影印，拓者不详。该版页有褚德彝题记：

宋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定为商代遗物，为海宁许氏旧藏，近已失去。此本尚是旧拓，可宝也。松窗记。^[2]

与其他拓本不同，此本拓出了舞部及枚部，属于分纸拓的可能性很大。整体类似剪影，有一定立体感但颇显僵硬。以平面视角构图，舞部似为分纸黏合而成，块面感较强，透视不准确。从图像判断，钟枚可能拓自原器，分步骤施拓，有拓纸剪裁复粘贴的迹象。

淮阴陈氏石墨楼旧藏本（图9），曾载民国廿五年（1936）《金石书画》第三卷第四十八期。淮阴陈氏，即陈锡钧（1880—1961）^[3]，斋号石墨楼。相较而言，此本全形的立体感最弱。拓者不详。平视构图，甬部较宽粗，鼓部墨色浓淡变化不明显。《金石书画》同一版面上排印了许槌题记。^[4]该本或许也是钟拓全形与题记拓合裱本。

陈介祺《传古别录》中有专节论述钟的拓法：

拓钟，须先以纸挖孔，套于甬乳上，孔大则黏纸使小，仅可下纸为是。以此纸样铺于棉连纸上，以水笔撕之。每孔自外去大半而连其内，须于纸样记明某钟存之。拓钟留孔不拓甬为大雅，斜贴作甬甚俗。拓甬须审其宽狭（追后拓，先撕一条长方孔落纸）。钟之上面无拓者，拓之则钟之尺寸甚明。^[5]

陈介祺认为将枚部作斜贴甬式拓出的方法“甚俗”。今见陈氏藏钟拓本，以枚部留白不拓，或仅拓枚部顶端的较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积古图》长卷中阮元藏器“录康钟”拓本，亦属此类。据同时代金石藏家张廷济的相关记载，此类拓本在当时被称为“全形拓”，且流通的时间不晚于嘉庆九年（1804）。那么，《积古图》中“录康钟”拓本，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钟全形拓本，拓

[1] 褚德彝（1871—1942），字守隅，号礼堂，浙江杭州人，金石学家、收藏家，著有《松窗金石文跋尾》。

[2] 《野语》1925年第3期，第1页。

[3] 陈锡钧（1880—1961），字伯衡，江苏淮阴人，迁居杭州。精碑版之学，收藏甚富。1934年底至1937年8月编辑《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

[4] 与山东省博物馆藏本有三处略有差异，彼“锈蚀”此作“深蚀”、“复入市”此作“至原肆”、第二处“筒瓦箱”箱字此作“厢”。原因未明。

[5] 《董斋传古别录》，清同治、光绪年间吴县潘氏京师刊滂喜斋丛书本。（原书未标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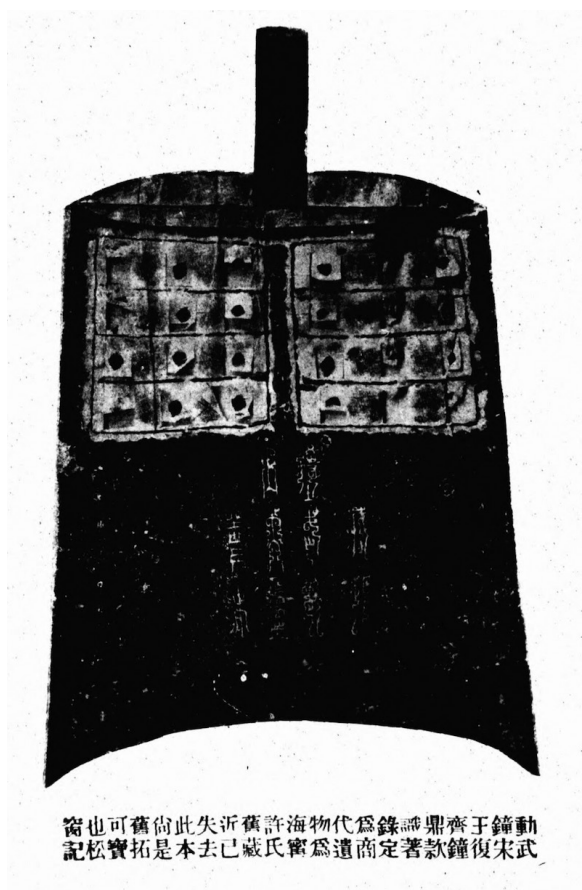


图8 《商动武钟拓本》，褚德彝旧藏（采自《野语》1925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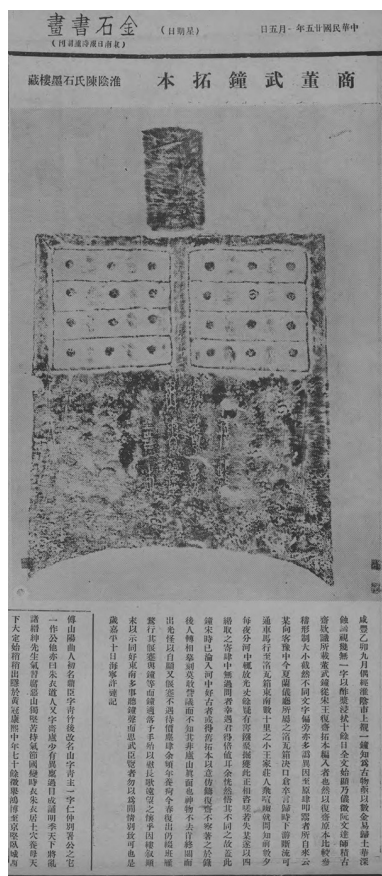


图9 《商董武钟拓本》，陈锡钧旧藏（采自《金石书画》1936年第三卷第四十八期）

制时间在嘉庆八年（1803）春之前。

在许槌、杨铎拓制“董武钟”之前，金石学圈中流传较多的钟类全形拓本，根据现存文献分析，主要有：阮元、张廷济、伊秉绶藏“虢叔大林钟”（即西周晚期“虢叔旅钟”，至今留存拓本较多，有六舟拓本、吴慈等拓本，杨铎曾藏阮元藏器本，许槌亦曾藏虢叔钟全形^[1]）、阮元藏“通录康虔钟”（即西周晚期“通录钟”）、翁树培藏“叔氏宝林钟”（即西周“士父钟”，据《金石索》冯云鹏记：“此翁宜泉比部藏器，叶东卿善于锤拓，以全图见寄。”^[2]又据张廷济日记，嘉庆九年请翁氏“再寄一纸全形”，所指当即拓宝林钟全形^[3]）、阮元藏“周公望钟”（即春秋晚期“邾公慆钟”，嘉庆九年十一月朱为弼曾许赠张廷济“周公望全形钟拓本”^[4]）、程木庵、张廷济藏“子璋钟”（春秋晚期器，许瀚《攀古小庐杂著》卷六著录此钟，其一为“杨石卿所藏全形拓本，瀚手摹其文字存之”。翁大年曾藏张氏藏器本全形，吴云经藏《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亦有

[1] 前引朱允元《戊戌钟歌》中言及：“况闻君家古均阁，双钩之本工且妍。周钟虢叔形细拓，汉碑夏承词独全。”

[2] （清）冯云鹏、冯云鹤辑：《金石索》金索卷一，清道光元年滋阳县署写刻本。（原书未标页码）

[3] 嘉庆九年张廷济致翁树培信札：“所藏钟文全形者已被友人取去□再寄一纸全形，知全形实在难拓，或止拓其文字□多寄数本也。”参见王艳明：《清仪阁中的金石鉴藏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20年。

[4] 张廷济：《与朱右甫书》，《张叔未日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此钟全形)、刘喜海藏“纪侯钟”(即西周晚期“纪侯甗钟”,《金石索》载:“叶东卿以全形拓本见贻。”)此外,吴云曾藏张应昌所赠“井人钟”(即西周晚期“邢人𠔁钟”)全形拓,并经藏张廷济“周水字钟”全形拓。

上述拓本中存世者,除个别拓出枚部、舞部外,大多数拓本钟枚以墨点表示,舞部不拓或仅以轮廓线示意。可见,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拓法。目前所知许氏藏“董武钟”全形拓,均为平视构图。粗略推断拓制时间,以许槌监制并跋本为最早,杨铎手拓本次之,褚氏藏本椎拓的时间最晚。拓本与木刻题记合裱本,拓制时间待考。

四、篆文“奇古”与“商器无疑”?

前引吴云致李鸿裔札,吴氏言“审其篆文,尚在西周之前”,意即许槌藏“董武钟”是商器,这应是参与酌酒评赏友人(包括吴云、韩崇、翁大年、许槌在内)的共识。吴大澂、罗振玉在跋拓本时,同样将董武钟定为铭文“奇古”的商器。学术研究犹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是时代的局限使然。其中,题跋者的品位和意趣,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铭文“奇古”与“商器无疑”的论断之间是如何关联的?这种观点,一方面说明阮元《积古》对晚清款识研究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映射出此时金石学家对商代古器尚质的审美观念,以及对鸟虫书这类铭文书体的认知。

在文献中,字形或篆法“奇古”,下文多与“不容尽识”“不可识”“不可辨”相连缀。奇、古,均是审美范畴的品评术语,在形容古铜器铭文时,二字同时并用,也意味着罕见、不容易辨识。包括鸟虫书在内的列国文字,自宋代起就被金石学者视为这样一种字体。陈介祺称这类铭文为“奇字”,称自藏有此类铭文的钟为“古奇字编钟”,题曰:“钟两面文各十二字,与董武钟相似,商器也。”^[1]可见,董武钟铭文,甚至被簠斋视为判定商代钟的标准之一。

陈介祺对古剑铭文的讨论,以及带有同类书体的戈、剑、壶、钟等器的分析,细微详尽,有助于我们理解吴、罗乃至此前金石学家对董武钟铭文的认识。陈介祺致王懿荣札中讨论王氏所赠“奇篆”剑铭文,云:

虞肩吾《书品》论“蛟脚旁舒,鹄首仰立”,与此正合,真夏代文字也。余谓此种是古奇字繁文,以篆为体,以虫鸟蛟龙为象,象或在篆上下者可释,否则不易。薛书所摹雕戈、商钟、钩带(带近峋嵒),阮书之董武钟、蛟篆壶(良史青笺题夏壶,是真象物文字。余之蛟篆戈,铸字,亦疑是古戈复又加凿款,凡无篆体可寻者,皆商前文字,近于叠篆者次之),与此近似,而刻本笔无重轻。余所藏古奇字编钟、奇字残剑,皆不如此之蛟脚独重,为今所未有。^[2]

今天所称“鸟虫书”的书体,《考古图》称为“虫鸟书”,《宣和博古图》《啸堂集古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称“蛟篆”。薛尚功著录战国早期戈为“夏珣戈”,误以戈铭为夏

[1] 即陈介祺所藏十钟之“虔秉钟”,是楚器。参见《簠斋吉金录》,民国七年风雨楼石印本。

[2] 陈介祺致王懿荣札,光绪九年(1883)六月廿八日,引自《簠斋尺牍》,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印本。(原书未标页码)

代文字。直至光绪初年，江淮一带吴、楚、越等国的铜器金石学家所见不多，对此类铭文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以篆为体，以虫鸟蛟龙为象”，陈介祺对铭文构形的认识已颇有创见。但他以此类铭文为“真象物文字”，沿用宋人的观点，仍定其为商代以前文字。

自阮元至陈介祺、吴大澂，皆因董武钟铭“奇古”而定为商代器，很少有人提出疑义。^[1]董武钟铭未能被充分识读，被标识为“篆文奇古”，进而与金石学家心中商器朴质的观念互相交织。董武钟被定为商器，正是两类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现存金石拓本上翁叔均跋语分析，“商制器多朴致，字多象形”，是他及同时代人关于商代青铜器的论述焦点。^[2]前引朱允元咏“董武钟”诗中亦有“我闻殷人器尚质，形制古朴无雕镌”句。商器“质古不华”、“字多象形”、字画奇古，是清代金石学家心目中商器尚质观的集中体现。而董武钟铭文屈曲回绕，在学者看来是一种带有象形拟物意味的书体，浑朴难以辨识，足以追想商代遗风。因此，以“董武钟”铭文或全形拓本为中心的品题，恰是自北宋以来金石家“以追三代之遗风”治学信仰的一个注脚。许梈深信自藏钟是沧入河中的三代法物，视为可“慰平生金石缘”，欣然传拓并公开“真面”。“陶斋”得拓本后，邀方濬益等同仁把酒评赏，他们依赖全形拓品味的重心，或许就是篆文之奇古、器制之朴致，以及溢于楮墨间的浑古韵味。

如前所述，潘祖荫、罗振玉对鸟虫书都经历了一个认知过程，可见晚清的学术交流并非呈线性发展。此中方濬益的观点，我们需要再次关注，因为方氏较早将董武钟铭的解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代文字尚矣，六经诸子由篆变隶，其在今日已非复先秦简编之旧。然则居今日而欲考文字制作之源、古文籀书小篆变迁之迹，舍彝器曷从哉。自宋人著录，分夏后商周，列作器之先后，则以篆文屈曲奇古者为夏，而吴延陵之剑、秦皇帝之玺，其文固龙虎虫鸟也。以甲乙丙丁十干名器者为商，而周器铭文三家之彝，其文亦父丙父丁也。……是夏商周世未可以强分也。^[3]

方氏以思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夏商周铜器的断代问题，提出不可强作区分，例如宋代以来以“屈曲奇古”者皆为夏代文字，而周秦之器上的奇古文字，实为“龙虎虫鸟”之文。他主张以铭文书势判断古器年代先后，提出《积古》所录董武钟是周器，其铭文是周时特有的一种书体：“余纂集彝器款识，专以书视辨时代之先后，为可据也。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殳书者。”^[4]这段文字见于其《彝器说·考文》，载《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首。关于钟铭书体的判断，比拓本上汪鋈“殳文之始”的说法，更进了一步。而方濬益题“董武钟”拓本，仅留观款并未论及铭文，这一观点的酝酿与品题拓本有无关联，尚难考证。

[1] 吕调阳（1832—1892）以《积古》所录董武钟为“吴器”，见《商周彝器释铭》卷六，清光绪十四年叶长高刊观象庐丛书本，叶11a。另据裘锡圭《古文字学简史》一文：“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参见裘锡圭：《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2] “翁氏题并爵：商器制作多朴致，字多象形，经传云‘商尚质’，当必有所征。今少峰集拓，以此列其首。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吴江翁大年题。”引自《小校经阁金石文字》6.27.2。

[3] （清）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首《彝器说·考文》，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景印本，叶4a。

[4] （清）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首《彝器说·考文》，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景印本，叶6a。

结 语

清代金石学史上对董武钟形制的关注与考辨，始于许槌藏器并制作全形拓。许槌藏董武钟全形拓本，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也让关切全形拓学术与艺术价值的今人，得知咸同年间全形拓的技艺与观念。尽管许槌旧藏是当时迎合金石学家嗜古的趣味而伪刻铭文的一件“董武钟”，与所谓“庐山真面”相背离，但这并不会削弱该钟全形拓本的学术性和艺术性。“董武钟”全形拓本，恰恰真实反映了：古物是如何获得的，“奇古”的篆文是如何激发金石学者崇古的信仰，《积古》曾对清代考释铭文、伪刻铭文各自产生哪些影响，全形拓曾满足了金石学者何种目标，全形拓在清人的金石生活中有何意趣。

许槌藏“董武钟”全形拓本，实质上提供了一个考察晚清金石学家在崇古信仰激发下对古器进行鉴赏和辨析的典型案列。许槌拓制全形的初衷是存古、传古，将董武钟的本来面目公诸同好，呈现董武钟敦穆朴雅的古质感，以技术的手段达到考订的目的。“疑古”辨伪与“传古”之思两相结合，这在古钟的传拓史上，堪谓特例，体现了较早时期全形拓具有研究效力（考订释疑）的一面。杨铎拓本，则揭示了全形拓在赏奇析疑与怡情悦性两个层面的意趣。董武钟之名重一时，与《复斋》《积古》著录款识、作伪者伪刻器铭、许槌的鉴赏和传拓全形直接相关。经由许槌、杨铎等传古的观念和实践，全形拓本的流传与品题，许槌、吴云、方濬益、吴大澂、潘祖荫、陈介祺、褚德彝、罗振玉等金石学者关于“奇古”篆文的认知，渐渐呈现出传统金石学视野中董武钟的形象。

补记：

本文提交之后，承蒙仲威先生见教，始知上海图书馆藏许槌题《商戊起钟》拓本、中贸圣佳25周年春季拍卖会（2020年10月）Lot3442即《董武钟》拓本，谨此致谢。现将上图藏《商戊起钟》拓本（载仲威编著《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文物出版社，2020年11月即出）相关信息略述于下：许槌隶书自题“商戊起钟”，钟拓之下为咸丰五年十二月隶书题记。钟之全形四周题跋累累，许氏考证颇详，释首字为“戊”，称器为“戊起钟”。该本对于探析许槌何以定器为商，是原始一手材料。许氏考辨此钟形制（“四十八乳”）、铭文（“止十字”“每笔往往作三叠文”）、铭文分布（“在鼓间”），皆属商制，认为此器是商钟无疑——“今海内止此一器”。以今日眼光来看，其考辨虽缜密翔实，然多臆断附会，可对照笔者拙文中“真面”部分的相关讨论。经比对，上图本长篇题记是许槌手书，当为木刻题记的祖本。上图本与存世其他诸本的关系值得再推敲，笔者拟另文探讨。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